

语料库翻译学:课题与进展^{*}

西安外国语大学 黄立波 北京外国语大学 王克非

提要:语料库翻译学近年成果集中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对翻译共性、译者风格等原有课题的认识深化;二是基于翻译语料库的语言变化探索和多模态口译语料库建设等新课题的开拓。本文的评析表明,今后的趋势是:1)关注点从翻译本身扩大到翻译外部,从翻译文本转向制约翻译文本生成的各类因素以及翻译带来的语言互动与变化;2)从描写转向解释,实证性和跨学科性进一步增强;3)打破了从前单语类比或单语类比加双语平行的综合研究模式,转变为根据实际研究需要建立的多重复合对比模式,并由对比模式向过程和因果模式过渡。

关键词:语料库翻译学、方法论、反思、趋势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429(2011)06-0911-13

一、引言

语料库应用于翻译研究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末期,主要是作为一种工具,进行语言对比和翻译批评方面的研究(参阅 Laviosa 2002:21)。90 年代初期,平行对齐的语料数据开始应用于机器翻译(McEnergy & Wilson 1993:8)。Baker “语料库语言学和翻译研究:启示与应用”(1993)一文,倡导用语料库方法研究翻译,标志着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范式的诞生。本世纪第一个十年是语料库翻译学大发展的时期,多本语料库翻译学论著陆续出版¹。2003 年,在南非 Pretoria 召开以“语料库翻译学:研究与应用”(Corpus-based Translation Studies: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为主题的研讨会,是国际上首次以语料库

^(*)本研究受到香港理工大学科研项目“Anaphoric corpus-based study of translational styles”(G-YX4G)资助,特此感谢。

翻译学为专题的国际会议。近年来,语料库翻译学研究内容更加丰富,对原有课题认识在深化,并不断有新课题产生。方法论也更为成熟,复合的对比模式逐渐取代单纯的单语类比或双语平行模式。2007 年,在上海交通大学召开“语料库与译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²,语料库翻译学的实证性和跨学科性的特点愈加突出。本文以此为时间参照,集中评析近几年此领域研究的课题和动向。

二、近年语料库翻译学研究概况

近几年国际上语料库翻译研究十分活跃,每年一会。2007 年的“语料库与译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可以说是对语料库翻译学研究课题、方法论和动向的一个阶段性反思。Baker(2007:50)从资源、新技术、合作项目、研究日程、方法论以及解释力等方面讨论了语料库翻译学这一阶段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语料库翻译研究方法论不仅在适应本学科的性质与要求,还力图与其他学科所采用的方法从总体上保持一致;此外,注重方法论的解释力,即研究者如何选择研究对象、如何呈现研究发现以及如何对研究结果做出明确、详尽的解释(同上:53-54)。这说明语料库研究是一个不断检验和完善假设的过程,是在实证基础上的描写,但描写的最终目的是对翻译现象做出合理解释。

2008 年,浙江大学主办了第一届“用语料库进行语言对比与翻译研究”(Using Corpora in Contrastive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UCCTS)的国际会议³。就翻译研究来看,这次研讨会体现出语料库翻译研究视角的多元化特征。从内容上,虽然还是集中在翻译语言特征、语料库与词典学、专门用途语料库的翻译研究等课题,但研究切入点除形式方面的句法结构外,还延伸到了话语、修辞和准翻译文本等非形式方面。Rocha(2010)以多文类的英语-葡萄牙语平行语料库为基础,讨论英语回指指示词 *this* 的葡萄牙语翻译,展示了基于平行语料库的话语分析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Ding *et al.* (2010)借助语料库,尝试建立英汉语中的隐喻翻译模式。Miao & Salem(2010)以傅雷译《约翰·克里斯朵夫》为语料库,将关注点放在译者注释上。此外,从内容上翻译共性研究已不再限于对假设的检验,而更多集中在对方法论的反思方面,尤其讨论了基于英语和其他欧洲语言的翻译共性研究结果是否适用于汉语等非印欧语系的语言。从对比模式上,已不限于单纯的平行或类比,而是多类文本的复合对比,如平行加单语库的翻译语言和中介语的类比。从技术层面看,仍然以平行语料库构建、语料库的对齐、语言单位识别与自动提取为主。语料库口译研究所占比重依然较小,内容和方法上主要还是以笔译语料库的研究模式为依据。

同年,英国 Multilingual Matters 出版社出版了论文集《共用语料库:语言学

家与译者》(*Incorporating Corpora: The Linguist and the Translator*)。此文集展示了语料库基础上语言对比与翻译研究领域内的新发展,所使用语料库涉及英、法、汉、波兰、捷克、斯洛文尼亚、匈牙利、葡萄牙、西班牙等多种语言,单从语种范围扩大这一点就可以看出语料库翻译研究发展之迅速。翻译共性依然是语料库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但主题是对方法论的反思,尤其是对相关概念的认识。Mauranen(2008)指出,“共性”这一概念被一些学者(如 Tymoczko 1998等)质疑,而且早先的某些假设与现有部分实证研究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矛盾和重复,但这些并不能否定翻译共性研究的价值。出现分歧的主要原因在于对研究对象的界定,如局部共性与整体共性、语际共性与语内共性(或源语型共性与目标语型共性)的划分等。Mauranen 认为“共性”并不一定意味着绝对法则,而在于对翻译语言的描写不仅有助于认识翻译的本质,双语加工语境下对语言的塑造更有助于理解其他类型的语言接触。Malmkjær(2008)从社会学和理论语言学的角度指出,规范属于社会文化范畴,而共性则属于认知范畴。可以看出,这一阶段对翻译共性的认识已经超越语言或文本本身,开始转向文本之外的社会、文化和心理因素。

2009年,比利时根特大学(University College Ghent)主办了“语料库翻译学方法论新发展”(Methodological Advances in Corpus-based Translation Studies)的国际会议⁴。此研讨会的宗旨是“鼓励在较少被研究的语言中开展语料库相关研究,同时鼓励能够推进翻译研究方法论和概念边界的研究”。大会倡导的研究课题有:隐化、指示语转换、源文本与目标文本信息结构的不同对称性、翻译语言的语域差异等。

2010年,英国的艾吉西尔大学(Edge Hill University)主办了第二届 UCCTS 会议。此次会议以翻译、语言对比和应用领域的语料库为关注焦点。就翻译方面的研究课题看,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翻译共性仍占据一席之地,但侧重于实证基础上对方法论的反思。第二,更加关注语料库的文类(genre)对研究结果的影响;语料已不仅限于文学与非文学的划分,还涉及商业、旅游、医学以及航空等具体文类。第三,与翻译相关的语料库类型有所增加(如中介语语料库、多语语料库等),在此基础上的对比模式多样化。第四,从描写走向解释。2011年,英国 Continuum 出版社出版了《语料库翻译学:研究与应用》(*Corpus-based Translation Studies: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文集,展示了近年来此领域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的进展。在内容上,从纯形式的考察对象转向话语层面,进而关注翻译带来的语言变化;在方法论方面,最大的进展是建立复合式的对比模式,并向过程和因果模式过渡。

三、语料库翻译学的进展:深化原有课题和开拓新课题

语料库翻译学发展初期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界定自己的研究对象。Baker (1993: 243-248)最初设想用语料库研究翻译主要是从翻译文本入手,从以下几方面展开:1)翻译语言普遍特征或翻译共性;2)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下的翻译规范;3)翻译中介过程研究、翻译单位的大小与性质,以及对等的类型与层次等。可见,当时设想的课题,不仅对翻译文本本身,还有对文本背后、翻译过程以及操作方式的关注,不仅包括语言,而且涉及社会、文化、认知等方面。但从后来的发展看,前两类课题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关注,其中共性研究成果丰富。对第三类课题的关注则较少,原因在于:尽管语料库是一个丰富的资源,但由于语料自动标注的信息有限,数据提取主要侧重于语言形式方面,对语义、语用层面的数据只能通过间接的方式获取,限制了这方面的发展。当前语料库翻译学的内容,不仅深化原有课题,还拓展出新的课题。

1. 翻译共性研究究竟有无价值?

翻译共性是语料库翻译学课题。Baker(1993)提出的翻译共性具体包括:显化、消歧、简化、合乎语法性、避免重复、凸显目标语语言特征及其分布六个方面。相关的实证讨论又增加了传统化、标准化、范化、净化等讨论,后来主要集中在显化、简化和范化三个方面,近年来又增加了独特项假设、干扰、非典型搭配、不对称假设等。这些分别以不同语对或语种的语料库为基础,以语际对比或语内类比为模式的实证研究,既有对原有假设的支持,又有不同程度的背离,引起研究者们对现有研究的反思⁵。

一些学者对共性研究持批评态度。Saldanha(2008:20)指出,现有关于显化的定义存在两个问题:第一,目标语文本中的显性程度并不一定与源文本中的隐性程度相对应;第二,目标文本“信息度”的增加并不一定是这种隐-显关系的结果;因此,要更全面认识翻译中的显化,就需要超越单纯的描写,挖掘译者使用显化策略的动机。House(2008:11-12)认为,“对翻译共性的诉求从本质上讲是徒劳的,也就是说,翻译共性不存在,也不会存在”。她提出了五个理由:1)翻译同样是对语言的运作,因此一般语言共性也适用于翻译;2)翻译作为一种实践活动涉及的主要是言语(parole),即语言运用,因此本身受具体语对限制;3)不同翻译方向上显化的表现并不一致,如英译德文本中表现出的显化并不一定出现在德译英文本中;4)翻译受具体文类限制,如科普文本和经济类文本翻译中所表现出的显化程度并不一致;5)从历时角度看,源文本某一文类语言的社会地位会影响翻译文本文类的性质以及具有类比关系的同类非翻译文本。

以上批评不无道理,但也不是很公平。首先,显化研究从对比模式上可以分为语际和语内/类比两种,前者是源文本与目标文本之间的对比,后者则是目标语内翻译文本与非翻译文本的比较。从影响因素方面,又可分为强制性和选择性两种,前者是语言系统影响的结果,后者则取决于译者、翻译过程、目标语规范等多种因素。从译者角度,又分为有意识的策略和下意识语言选择的结果。Saldanha 的切入点是源文本中的选择性连接词、自我指称和文化局限词在目标文本中的处理,因此她关注的是语际显化。其次,她将译者有意识的翻译“策略”与译者预期的读者群以及译者对自身作为文学或文化中介者的认识联系起来。但以此为标准来衡量其他不同类型的显化研究还不够充分。House 讨论的也是语际共性,但她的观点比较极端,直接否认翻译共性的存在。其实,House 的理由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就第 1) 条而言,语言共性是独立单语之间的比较,翻译共性研究中具体语对表现出的属于“局部共性”(local universals),不同语对都表现出的属于“总体共性”(global universals),但两种共性都是从源语到目标语的转换过程或产品表现出的特征,因此语言共性可能部分适用于翻译共性,但翻译共性不会全是语言共性。第 2)、3)、4)、5) 条中的具体语对、翻译方向、文类和语言的相对社会地位都是翻译共性研究中的变量,不同变量控制的研究结果属于“局部共性”,而“局部共性”是我们认识“总体共性”的一条途径。

但上述讨论提出的一些观点也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可供今后研究借鉴。第一,共性研究应该超越描写,将重点放在对现象的解释方面。下意识语言选择造成的显化可从心理语言学视角来探索,有意识的显化策略则可从社会、文化等视角来考察。例如 Pym(2005)指出,导致译者采用显化策略的一个社会性动机就是他们的交际风险意识,即要确保原作者和目标语读者的沟通,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误解;第二,共性研究中对具体语对、翻译方向、文类、源文本相对社会地位等变量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研究结果的信度。其实,“翻译共性”与“忠实”、“对等”、“规范”等一样,都是翻译学研究的基本概念工具,与特定的研究取向对应,“忠实”对应语文翻译取向,“对等”对应语言学翻译,“规范”对应描写翻译学,“翻译共性”则对应语料库翻译学。正如不存在绝对的“对等”,也不一定有绝对的“共性”,但它们都是我们认识翻译现象的手段。Toury(2004:29)曾指出,翻译共性研究并非一个存在与否的问题,而是一个解释力问题,即如何借助各种概念工具对翻译现象进行更好的解释。这是对“翻译共性”概念的一个客观评估。

2. 是译者风格还是翻译风格?

2000 年, Baker 发表“文学作品译者风格考察方法论探索”一文,提出了语料库翻译学的又一重要课题——“译者风格”(translator(s) style)研究。此种

研究不同于一般意义上以源文本/原作者文体/风格为关注焦点的翻译文体研究,而是以某一位(几位)译者所有的文学翻译文本为语料,从语言形式特征,如类符-形符比、平均句长、叙述结构等方面的语料库统计数据入手,关注文学翻译译者或译者群体独有的翻译语言特征。Baker(2000:245)将这种风格理解为一种“指纹”,即一位译者在翻译不同文学作品时,其译文所表现出的一些规律性语言模式,这些语言模式并非一次性的,而是为译者偏爱、反复出现、习惯性的语言行为模式,而且这些特征不完全是源文本或原作者语言风格影响的结果。严格地讲,Baker 倡导的基于语料库的译者风格研究有三个特点:第一,目标文本导向(target text-orientedness)。译者风格研究中,目标语文本整体是分析的焦点,分析过程通常不考虑对应的源文本。第二,译者下意识的语言行为。译者风格考察的各类特征是译者下意识或习惯性选择的结果,而非针对源文本的有意识反应行为。第三,区别性。数据统计分析的结果能将该译者的风格与其他译者区分开来。

近年,研究者们从译者角度对翻译中的文体提出了不同的诠释方式。Bosseaux(2007)考察了弗吉尼亚·伍尔夫小说《海浪》(*The Waves*)和《到灯塔去》(*To the Lighthouse*)法文译本中视点的语言表现形式——自由间接引语、指示语、情态和及物性——的翻译,从叙事学视角考察了译者的选择会对叙事结构转换产生什么样的影响。Bosseaux 在研究中使用的是双语库,关注的对象是翻译文本,但她的研究并未忽略源文本的角色。Winters(2007,2009)以菲茨杰拉德小说《美女和被诅咒的人》(*The Beautiful and Damned*)两个德文译本为语料,分别以情态小词(modal particles)和言语行为转述动词为考察对象,讨论了两位德国译者的翻译风格。她使用的语料库为双语平行语料库,所考察的项目均与源文本相关联。Yu(2007)从英译汉的视角讨论了海明威小说《老人与海》两个中译本(余光中 1952 和张爱玲 1954)在译者文体方面的差异,具体考察了平均句长、类符-形符比、汉语特有句末语气词和常用词几个方面。Wallaert(2010)指出 Winters(2007)研究方法的不足之处,提出用文本与准文本结合的方法(textual and paratextual approach)对译者风格进行描写,即不仅要阅读原文和译文文本进行阅读,还要关注文本外的各类准文本。Pekkanen(2010)从翻译过程中的非强制性形式转换入手,考察翻译小说作品中译者的个人印迹(translator's personal imprint),具体围绕根据译者的选择模式来区分不同译者或对个体译者的风格做个性化描写。Saldanha(2011)区分了两类翻译文体研究:翻译文体(translation style)和译者风格(translator style),指出前者将文体视为目标文本对源文本的应对方式,而后者则是译者特有的表达方式,并且在源

文本不同的情况下也会保持一致。Saldanha 进一步通过对翻译文本中强调式斜体和外来词使用的统计分析,考察了两位英国译者——Peter Bush 和 Margaret Jull Costa——的译者风格。

上述研究大都没有完全根据 Baker(2000)的方法论。那么讨论译者风格时是否需要考虑源文本?译者风格到底是有意识的语言行为还是下意识的语言习惯?以这些问题为出发点,我们用同样的方法对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和戴乃迭(Gladys Yang)两位译者翻译中国现当代小说的风格做考察,发现两位译者在这几方面差异并不大。另外,对照《红楼梦》几个英译本,以及英国“翻译英语语料库”(TEC)翻译小说子库在这几方面的统计数据发现,文学类翻译英语在类符/形符比、平均句长、叙述结构(这里指选择性 *that* 的使用)方面差异不明显,并不足以据此来区分不同译者的翻译风格。本文认为,脱离源文本而仅对译文做纯形式的语料库统计对于翻译研究而言意义不大。译者的选择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下意识的选择;另一类则是译者面对源文本的一些特定现象所做出的一些规律性的、有意识的选择。据此,译者风格研究可分为“目标文本型译者风格”(TT type, T-型)和“源文本型译者风格”(ST type, S-型)两大类,前者就是 Baker(2000)所说的“译者风格”,类似于“作者风格”。后者与传统的翻译文体研究相似,主要关注译者如何在翻译文本中来表现源文本中的某些特征,不同于以往的是关注对象是译者规律性的处理方式,用 Saldanha(2011: 27)的话来说, S-型译者风格研究关注的是译者“对源文本的反应方式”,是一种有意识的语言行为。相比而言,以平行语料库为基础对 S-型译者风格的关注更有意义一些。

3. 基于翻译语料库的语言变化探索

目标语语言变化的一个动因就是翻译带来的语言变化,这是一个历时的过程,大规模的语料库可以提供这方面研究的基础。近年来,除了翻译共性和译者风格外,通过语料库方法探索翻译对语言的影响开始成为语料库翻译研究的一个新课题。

Laviosa(2007)提出以 Hoey(2005)的“词汇启动”理论为基础考察翻译所导致的目标语的变化,她具体关注了英语外来语(Anglicisms)在英语-意大利语翻译中的词汇启动现象,并提出三个假设:1)意大利语中英语外来语的词汇启动方式不同于其在英语中的方式,即英语外来语在源语和接受语之间发生了漂移;2)译者可在使用目标语中的词汇启动、引入源语言的词汇启动和二者混用之间做出选择;3)支配翻译文本的规范不同于支配同类型非翻译文本的规范。这应当说是语料库翻译学跳出翻译文本的局限,开始关注翻译与语言变化的关系这一新课题。Hoey(2011)以三名母语为葡萄牙语的研究生翻译美国作家 Bill

Bryson 的游记散文《不是故乡非客乡：旅欧纪游》(Neither Here Nor There: Travels in Europe, 1991)的开篇句子为语料,对比分析了英语原文与三种葡萄牙语译文中的词汇启动现象,并以葡萄牙语语料库为参照库对相关词汇进行检索,发现在翻译中,是采用目标语中的词汇启动模式,还是引入源语言的词汇启动模式,都由译者来决定,但译者选择哪一种,则一方面取决于此种词汇启动模式是单个现象还是群体现象,另一方面就是看接受者的偏好。译者的选择倾向是语言变化的一个动因。Munday(2011)以英国国家语料库(BNC)和一个西班牙语语料库(CREA Spanish Real Academia Corpus)为参照库,考察了英语 *loom* (*large*)与其西班牙语对应词 *cernerse* 的语义韵律差异,指出语义韵律并非直觉性的,在翻译中译者往往会仿照源文本的韵律模式,但实际上源文本的模式在目标文本中并不一定得体,语料库检索可弥补此方面的不足。House (2011)的视角更广一些,她讨论了如何运用语料库方法,来考察作为世界通用语(*lingua franca*)的英语怎样通过翻译和多语文本生成等语言接触方式来引发并推动语言变化。她具体考察了英德翻译是否使德语表现出这样一些变化趋势:1)德语传统上强调语言的概念功能→英语强调语言的人际功能;2)德语文本强调信息的显性→英语强调推理得来的隐性和命题的不透明性;3)词汇信息密集性、综合性、层级性的信息结构→松散、线性、句子的信息结构;4)非连续的语序→连续的、并置的语序。考察结果有些支持这些假设,有些则不支持。在此基础上,House 提出了未来这方面研究的三个模式。House 的研究告诉我们,翻译语料库不仅可以研究翻译现象,还可以透过翻译来探索翻译活动导致的语言变化,这是语料库翻译学研究的一个新路子。

4. 语料库口译研究新动向——多模态口译语料库的建设

Setton(2011:34)指出,口译研究更多涉及的是认知和心理语言过程,从这个意义上口译语料库是一个丰富但尚未得到充分开发的资源库,因为现有研究主要遵循笔译语料库研究的模式,将主要关注点放在翻译产品上。从方法上,有描写研究和过程研究两种。一方面,基于真实口译语料库(如欧洲议会口译语料库,EPIC)的描写研究有助于我们发现口译培训所需的专业技能,另一方面,心理语言学范式下的实验性研究却可以更多地揭示口译的语言心理过程。前者注重口译产品,后者则关注口译过程,两种模式各有优势。但到目前为止,后一种研究尚未取得实质性发现,部分原因在于实验设计,主要原因在于用于阐释实验数据的理论基础不完善,导致对各类变量的控制与分析、抽样语料库的大小及代表性、实验环境与真实环境的差异没有统一的标准,使研究结果在信度方面存在一定问题。

多模态话语分析(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是指从文本、声音、图像等多角度对语言交流活动进行描写的研究途径,这一方法正好适合口译研究的需要,因为口译研究中,仅对口译员的书面文本进行分析还不够。目前的口译语料可以对说话人和口译员的言语及说话过程中的停顿、口误等做出标注,多模态的口译语料还会标出说话者或口译员的手势、节奏、声音大小、现场的各种环境因素等,真正实现对“使用中语言”的多重描写,不仅从形式、语义,还能从语用方面达到对口译过程的全面分析,实现对口译过程而不仅仅是产品的分析研究,而且这些研究结果还可直接应用于口译培训,特别是实战训练。Setton(同上:49)提出,未来的研究可以有两大类:第一类是大规模语料库中可以统计的特征,这些特征可以作为口译员表现或口译文本的标志;第二类是局部微观过程,这类研究要求有共时的数据输入与输出和捕捉语用特征(如韵律)的研究框架。大规模多模态口译语料库的建设将为今后这方面的研究奠定基础。

四、语料库翻译学研究的趋势

第一,关注点从翻译本身转向翻译外部,从翻译文本转向制约翻译文本生成的各类因素,以及翻译带来的语言互动与变化。

语料库翻译学发展初期,研究重心主要集中在对翻译共性的考察方面,考察方式主要是从类符-形符比、平均句长、词汇密度等纯形式方面。Baker(2000)提出用语料库的方法考察文学译者的翻译风格,也仅限于对翻译文本形式特征的统计。近年来的研究开始将翻译作为语言接触的一种形式,关注翻译活动中的语言互动和翻译带来的语言变化,即便是对翻译现象本身的描写,也将重点放在了从外部的解释方面,更多地将语境纳入语料库研究方法的视野。如 House(2011)的研究对象就是通过翻译语料库来探究语言接触带给目标语的语言变化。

第二,从描写转向解释,实证性和跨学科性进一步增强

对翻译共性的研究不再限于描写,而是将重点放在解释方面。按照 Chesterman(2004:44-45)的观点,对翻译共性的解释可以从人类认知、翻译作为沟通行为的本质和译者对自身社会-文化角色的认识三个方面进行。这样一来,翻译共性研究将语言现象与社会、文化、认知等因素紧密结合,集中体现了翻译研究的跨学科性。Lavisoa(2007:57)在综述共性研究取得的成绩时指出,共性研究将语料库翻译学的性质由描写推向实证,并且超越了实证,从认知等视角探究解释这些规律性的翻译行为。实证研究提高了翻译研究的客观性,使其能够与其他学科在方法论上达到一定的共享。House(2011:206)就方法论还进一步指

出,尽管语料库研究方法有很大潜力,但其仍是众多研究方法的一种,需要与其他方法结合使用,不能仅局限于描写-分析模式,更要向探索-解释方向发展。社会学、心理语言学、认知研究等知识在语料库翻译学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研究的跨学科性可以进一步推动语料库语言学的发展。

第三,打破了从前单语类比或单语类比加双语平行的综合研究模式,转变为根据实际研究需要建立多重的复合对比模式,并由对比模式向过程和因果模式过渡。

Baker(1995,1996)正式提出了不同于传统对比模式的单语类比研究模式,主要应用于考察翻译共性。但 *META* (1998:43/4) 专号中的许多研究由于对研究对象的界定不同,还是采用了双语平行的模式。Baker(2000)所倡导的文学翻译译者风格的语料库考察,在方法论上也是属于单语类比的模式。Kenny(2005)在此基础上倡导将平行语料库重新引入到翻译共性研究方面,重新考虑源文本在语料库翻译研究中的地位。但是,近年来语料库翻译研究的对比模式都不再是单纯的平行或对应,或是简单的平行加类比,大多都是复合式的对比模式,并向过程和因果模式过渡。如 House(2011)所使用的语料库有三类,既有平行,也有各种类型的类比;口译研究中的对比模式因为译者的身份差异、翻译模式等就更复杂一些。如 EPIC 中包含英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以及每种语言同声传译的其他两种翻译语言,这样就构成了一个复合的平行或类比对对应关系,研究者可以根据需要任意选取组合,对翻译现象进行三角考察,而且最终的落脚点都放在了对现象的解释上。

五、结语

语料库翻译学在短短二十年里,经历了从研究途径到方法论,再到一种新研究范式的发展过程,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它对翻译学科最大的贡献有三点:第一,它提出的“翻译共性”、“译者风格”等基本概念有助于更好地认识研究对象;第二,多种类型语料库综合使用的多重复合对比模式可提供更多的研究视角;第三,实证研究中的描写和解释过程拉近了翻译学科与其他相关学科的距离,跨学科的特点会进一步推动语料库翻译学向前发展。

注 释

1. 2001 年,Dorothy Kenny 的专著《翻译中的词汇与创造性:基于语料库的研究》(*Lexis and Creativity in Translation: A Corpus-based Study*)出版,使以平行语料库为基础的语际对比研究重新得到认可;2002 年,Sara Laviosa 的专著《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理论、发现与应用》(*Corpus-based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y, Findings and Applications*)出版,总结了前一阶段语料库翻译学的成就;2003 年,比利

时鲁汶大学(University of Louvain)的 Sylviane Granger, Jacques Lerot 和 Stephanie Petch-Tyson, 根据当时对比语言学与翻译研究的新发展主编了论文集《基于语料库的对比语言学和翻译研究方法》(*Corpus-based Approaches to Contrastive 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2004 年, Routledge 出版社和南非大学出版社合办的期刊《语言问题: 非洲语言研究》(*Language Matters: Studies in the Languages of Africa*, 35/1) 出版了语料库翻译研究专号; 同年还有瑞典的哥德堡大学(Göteborg University)出版社出版了《翻译与语料库》(*Translation and Corpora*)论文集、Routledge 出版的 Meave Olohan 的专著《翻译研究中的语料库》(*Introducing Corpora in Translation Studies*)以及 John Benjamins 出版的翻译共性研究专题论文集《翻译共性是否存在?》(*Translation Universals: Do They Exist?*)。

2. 此次研讨会将有 7 个议题: 译学研究语料库的创建、语料库方法在译学研究中的应用、基于语料库的译者风格研究、语料库方法和性别差异研究、文化关键词的语料库分析、语料库与翻译批评、语料库与口译研究。
3. 此次大会会有六个议题: 类比与平行语料库的设计与开发; 多语语料库的加工; 用语料库进行翻译研究与教学; 用语料库进行跨语言对比; 基于语料库的源语言原创文本、翻译文本和目标语原创文本的对比研究、基于语料库的语言对比与翻译研究界面, 该会议的论文集《用语料库进行语言对比与翻译研究》(*Using Corpora in Contrastive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2010 年由英国 Cambridge Scholars 出版社出版。
4. 此次会议的主题是: 1) 同一语言中翻译文本与非翻译文本的关系; 2) 源文本与目标文本的关系; 3) 翻译研究中数据采集与分析技术和方法的创新。
5. 对翻译研究共性研究方法论的集中讨论主要见于 2004 年的《翻译共性是否存在?》(见注 1)。2007 年之后的讨论见 Laviosa 2007, Houese 2008, Saldanha 2008 等。

参考文献

- Anderman, G. & M. Rogers (eds.). 2008. *Incorporating Corpora: The Linguist and the Translator*[C].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 Baker, M. 1993. Corpus 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Implications and applications [A]. In M. Baker, G. Francis & E. Tognini-Bonelli (eds.). *Text and Technology: In Honour of John Sinclair*[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33-250.
- Baker, M. 1995. Corpora in translation studies: An overview and some 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J]. *Target* 7: 223-243.
- Baker, M. 1996. Corpus-based translation studies: The challenges that lie ahead?[A]. In H. Somers (ed.). *Terminology, LSP and Translation*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75-186.
- Baker, M. 2000. Towards a methodology for investigating the style of a literary translator? [J]. *Target* 12: 241-266.
- Baker, M. 2007. Corpus-based translation studies in the academy [J]. *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s* (5): 50-55.

- Woolf into French [M]. Amsterdam: Rodopi.
- Chesterman, A. 2004. Beyond the particular [A]. In A. Mauranen & P. Kujamäki (eds.), *Translation Universals: Do They Exist?*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33-50.
- Ding, Y., D. Noël & H. Wolf. 2010. Patterns of metaphor translation: Translating FEAR metaphors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A]. In R. Xiao (ed.), 2010. 40-61.
- Hoey, M. 2005. *Lexical Priming: A New Theory of Words and Language* [M]. London: Routledge.
- Hoey, M. 2011. Lexical priming and translation [A]. In A. Kruger, K. Wallmarch & J. Munday (eds.), 2011. 153-168.
- House, J. 2008. Beyond intervention: Universals in translation? [J]. *Trans-Kom* 1: 6-19.
- House, J. 2011. Using translation and parallel text corpora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global English on textual norms in other languages [A]. In A. Kruger, K. Wallmarch & J. Munday (eds.), 2011. 187-208.
- Kenny, D. 2005. Parallel corpora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Old questions, new perspectives? Reporting *that* in Gepcolt: A case study [A]. In G. Barnbrook, P. Danielsson & M. Mahlberg (eds.), *Meaningful Texts: The Extraction of Semantic Information from Monolingual and Multilingual Corpora* [C]. London: Continuum. 154-165.
- Kruger, A., K. Wallmarch & J. Munday (eds.), 2011. *Corpus-based Translation Studies: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C]. London: Continuum.
- Laviosa, S. 2002. *Corpus-based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y, Findings and Applications* [M]. Amsterdam: Rodopi.
- Laviosa, S. 2007. Similarity and difference in corpus-based translation studies [J]. *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s* (5): 56-63.
- Malmkjær, K. 2008. Norms and nature in translation studies [A]. In G. Anderman & M. Rogers (eds.), 2008. 49-59.
- Mauranen, A. 2008. Universal tendencies in translation [A]. In G. Anderman & M. Rogers (eds.), 2008. 32-48.
- McEnery, T. & A. Wilson. 1993. Corpora and translation: Uses and future prospects [OL]. <http://ucrel.lancs.ac.uk/papers/techpaper/vol2.pdf> (accessed 11/07/2011).
- Miao, J. & A. Salem. 2010. The specificity of translator's notes: Lexicometrical analysis of notes in Fu Lei's translation of *Jean-Christophe* by Roman Rolland [A]. In R. Xiao (ed.), 2010. 79-108.
- Munday, J. 2011. Looming large: A Cross-linguistic analysis of semantic prosodies in comparable corpora [A]. In A. Kruger, K. Wallmarch & J. Munday (eds.), 2011. 169-186.

- through Shift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M]. Helsinki: Helsinki University Print.
- Pym, A. 2005. Explaining explicitation [A]. In K. Karoly & A. Fõris (eds.), *New Trend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In Honor of Kinga Klaudy* [C]. Budapest: Akadémiai Kiadó. 29-34.
- Rocha, M. 2010. Translating anaphoric *this* into Portuguese: A corpus-based study [A]. In R. Xiao (ed.), 2010. 11-39.
- Saldanha, G. 2008. Explicitation revisited: Bringing the reader into the picture [J]. *Trans-Kom* 1: 20-35.
- Saldanha, G. 2011. Translator style: Methodological considerations [J]. *Translator* 17: 25-50.
- Setton, R. 2011. Corpus-based interpreting studies (CIS): Overview and prospects [A]. In A. Kruger, K. Wallmarch & J. Munday (eds.), 2011. 33-75.
- Toury, G. 2004. Probabilistic Explanation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Welcome as they are, would they qualify as universals? [A]. In A. Mauranen & P. Kujamäki (eds.), *Translation Universals: Do They Exist?*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5-32.
- Tymoczko, M. 1998. Computerized corpora and the fu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J]. *Meta* 43: 652-660.
- Wallaert, I. 2010. The elephant in the dark: Corpus-based description of translator's style [OL]. <http://www.cahiersdugpe.fr/index1641.php> (accessed 20/03/2011).
- Winters, M. 2007. F. Scott Fitzgerald's *Die Schönen und Verdammten*: A corpus-based study of speech-act report verbs as a feature of translators' style [J]. *Meta* 52: 412-425.
- Winters, M. 2009. Modal particles explained: How modal particles creep into translations and reveal translators' styles [J]. *Target* 21: 74-97.
- Xiao, R. (ed.). 2010. *Using Corpora in Contrastive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C]. New Castle upon Tyn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 Yu, Ching-hua. 2007. Similarity and difference in translator's style: A case study of the two translations of Hemingway's work [OL]. <http://www.acad.ntnu.edu.tw/cubekm/front/bin/download.phtml?Part...85> (accessed 16/12/2010).

收稿日期:2011—08—29;本刊修订,2011—10—14

通讯地址:710061 陕西省西安市 西安外国语大学英文学院(现为香港理工大学博士后)(黄)
100089 北京市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王)

then used to evaluate the research designs of nine interpreting studies that adopted TAPs as their research method. It is shown that most of the surveyed studies did not meet these criteria. The paper concludes by giving suggestions on how to ensure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future TAPs interpreting research.

Corpus-based translation studies: Issues and progress (p. 911)

HUANG Libo (School of English Studies,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Xi'an 710128, China)

WANG Kefei (National Research Centre for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Corpus-based Translation Studies (CTS) has gained marked achievements in recent years, which is manifested in two aspects; one is a deepened understanding of such old topics as translation universals, translator's style, etc.; the other is the development of new topics, such as corpus-based explorations of language changes, construction of the multimodal corpus for interpreting studies, etc.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CTS presents some new tendencies including 1) a shift of focus from translation proper to the external contexts of translation, that is, from translated texts to factors that constrain translation text production and to the changes brought about to the source or target languages; 2) a shift from description to explanation with an increase in empiricism and multi-disciplinarity; 3) the simple mono-lingual comparable, interlingual parallel research model or an integrated one of both has been replaced by the multiple-complex models in relation to research needs with a tendency toward process and causal model.

Foreign language use in Chinese metropolises: An analysis of evidence from a national survey with special references to Beijing, Shanghai, Tianjin, Guangzhou, Shenzhen, Chongqing and Dalian (p. 924)

WEI Rining (Dept. of Chinese and Bilingual Studies,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Hung Hom, Kowloon, Hong Kong, China)

SU Jinzhi (Institute of Applied Linguistics, Ministry of Education, Beijing 100010, Chin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aw self-reported data from the national "Survey of Language Situation in China" concerning residents' foreign language reading proficiency, spoken proficiency and frequency of language use, with special references to seven metropolises. In the three surveyed areas, the national averages were rather low, while the averages of most of the seven citi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national averages, probably because respondents with relatively high education qualifications were over-represented in the city samples; the effect sizes for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ities' averages and their national counterparts differed amongst those cities, which might be partially attributed to the factor of education qualification.

Advances in conceptual metaphor studies in neuroscience: A focus on the issue of psychological reality (p. 934)

JIANG Guiying & LI He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put forward by Lakoff via phenomenology has been challenged ever since its advent. One challenge concerns the existence/non-existence of its psychological reality. In earlier times, owing to the limitations in methodology and research perspectives, the arguments on both sides were confined to ontological verifications and hence failed to reach any final conclusion beyond the level of logical reasoning. Findings from recent studies in neuroscience show that conceptual metaphor is based on mental simulation function of the neurons and that psychological reality does hold in behavior, neuropsychology and individual development. In an epistemic stance, the paper gives an overview of the latest explorations into the psychological reality of conceptual metaphor in neuroscience, expos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previous experimental studies and provides a prospective outlook for further study. Language is embodied in the mind and materialized in the brain. Studying metaphor via neuroscience helps consolidate and further develop the theory.